

# 导论

■ 黄贤强

欣逢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160周年会庆，该会馆决定在多项庆祝活动中，加入出版学术专集一项，这符合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多年以来形成的一个特色，即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密切合作，积极推动客家学术文化研究和出版。这或许是在新加坡众多的民间社团和会馆中难得看到的景象，实属可嘉。

本书收录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和泰国研究客家的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学术论文，议论对象包括各地的大埔人、东南亚客家人、亚洲其他地区客家人，议题则包括会馆和社群、人物和社会、信仰和网络、客家认同与意识，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综合各论文研究的地域范围和议题归类，本书分为四大辑。

第一辑的主题为“大埔客家人和社群互动”，主要是讨论各地的大埔人及其会馆，以及与其他社群的互动关系。林开忠的论文〈从潮客到大埔客家：战后檳城大埔同乡会的探讨〉厘清了新马<sup>1</sup>大埔

---

<sup>1</sup> “新马”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简称。在这两个国家分别独立前的一段长时间，他们都属于英国的殖民地，两地的行政管理有相当的一致性，民间交往也没有阻碍，故常言“新马一家”。



人身份认同的演变。作者以檳城大埔同乡会的成立经过，讨论了大埔人如何从原本隶属于广帮（省级概念），逐渐转向潮州（府级概念），最后再建构自身的大埔（县级概念）客家认同的过程。这个演变符合了族群理论中的“情境论”（circumstantialism）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转向情感认同之“原生论”（primordialism）的趋势。作者亦针对檳城大埔人在二战后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发现其社群领导层从政治权威转向经济挂帅，并透过社群内部的组织和活动，增强其情感认同的部分。利亮时的文章〈从隆新两地的会馆来透视大埔人与潮州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关注大埔会馆和潮州会馆的复杂关系，并以两地各两所的会馆，即雪隆<sup>2</sup> 茶阳（大埔）会馆和雪隆潮州会馆以及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和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作对比研究。从客、潮的移民发展进程来看，这两社群的互动突显出社群间频繁的分合现象。作者认为社群的人数之多寡与经济势力之强弱固然影响客潮的分合关系，但隆新两地华人次族群之间的合纵连横关系同样扮演另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

如果上述两篇文章是以会馆切入来探讨大埔客家人与其他社群的互动关系，第三篇文章，即安焕然的〈萧畹香与萧光麟——马来西亚新山两位大埔客家领袖的扎根与寻根之旅〉则以两位马来西亚的大埔客家领袖为焦点，讨论两代人的在地关怀与祖籍寻根的同与异。萧畹香和萧光麟是叔侄关系，一是儒商，一是专业名医，他们都曾是新山客家公会的重要领导人，也都对当地的社会公益和华教事业有巨大的贡献，同时两人对客家祖地的“寻根谒祖”活动也充满情怀。作者认为透过两人事迹的讨论，可以看出在地实业扎根的“安身斯土”和对祖籍地寻根谒祖的“望乡情怀”不仅没有明显的矛盾，而且是可以同时并存的。第四篇文章跳离新马两地，着眼于台湾的大埔客家人。相对于新马大埔客家人的研究，台湾大埔客

<sup>2</sup> “雪隆”指今之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和吉隆坡直辖市。

家的研究是比较冷淡的，但近十余年来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张维安和叶依婷的〈台湾大埔客家研究回顾〉，除了介绍有关台湾大埔客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外，也介绍了当地讲大埔腔的客家人的人口分布和生活情况，以及大埔客家文化学术化的意义。

第二辑的主题为“新马客家意识、形象和网络”，内容不限于大埔客家人，而是扩大到新马地区其他客家人的研究，包括将整体客家人当作研究的对象，其中当然也包括大埔客家人，或以某个城镇的客家人及其会馆当作研究个案。如果将东南亚客家人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南洋客属总会”往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它于1929年成立伊始，就有代表整个南洋地区客家人的使命。白伟权和张翰璧合撰的论文〈由小团结而大团结：星洲客属总会与南洋客家意识的传播与维系（1923-1965）〉，着重于南洋客属总会成立前后，客家意识在南洋的形成、传播与维系。作者认为，南洋当地华人族群关系及祖国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危机意识提供了客属侨民相互凝聚的契机。在传播上，作为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新加坡在客属意识的传播与统合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客属总会与各地属会之间透过推动客属同侨福祉的相关事务来维系彼此的关系，同时也不断地提醒本区域客家社群的“客属”身份，形塑出“南洋客属”的认同意识。黄贤强和应尚君的论文〈廿世纪初期英文报章中的客家人形象——以新加坡《海峡时报》的报道为例〉，则以新加坡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章为基本材料，讨论英语世界的报人是如何呈现客家族群，又或在报道中的客家人是以何种形象出现。作者认为《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所呈现的客家移民的生活处于两极化，贫富差距严重，对下层客家移民形象总体趋于负面，而对社会上层的客家人的慈善行为或社会影响力给予肯定。作者也关注到英文报章相对频繁地报道教会的客语布道活动。



张陈基和萧新煌的论文〈新加坡客家社团的社会网络模式〉是透过社会网络分析法，并以“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来探讨新加坡客家会馆之间相互依赖之关系，以及其等与外部各项资源的连结。作者透过横断面研究方式重新检视客家会馆在新加坡的发展脉络，并对新加坡客家会馆进行内部网络以及外部网络分析。作者发现在全球化环境下的新加坡客家会馆已经有了改变，除了传统核心团体组织仍具影响力之外，以艺文活动为连结的社会网络愈显重要，宗教信仰以及传统文化活动也还有其根基。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客家会馆与中国原乡的关系日渐式微，反而是开启了新加坡特有的客家文化传承方式。黄文斌的文章〈增城客家人的移居与发展：以马来西亚金宝增龙会馆为例〉是以客家移民中人数较少的增城人及其在马来西亚的会馆为研究对象。马来西亚有十间增城与龙门客家人联合组成的乡团组织，其中有七间在矿产丰富的霹靂州，因为增城客家人多数是从事开采锡矿业的移民群体。作者以金宝增龙会馆作为一个研究个案，探讨这些少数客家族群如何在一个地区落地生根及其群体组织和网路的运作模式。

“亚洲各地的客家人社会和信仰”是第三辑的主题。过去海外客家人的研究中，新、马、印（尼）客家人一直是研究重点。近年来，包括日本和泰国等地亚洲国家的客家研究也引起学界的注意。有关日本华商的研究过去比较偏向于广东（广肇）、福建和三江等三帮华商，陈来幸的论文〈客家商人与近代日本华侨社会〉是少数研究日本客家商人的一篇论著。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中日两国之间贸易的兴起引导了神户和大阪两港的抬头，并促进了出身地多元型的神户华侨社会的形成。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成为亚洲近代化的成功榜样。荷属巴达维亚梅县客家侨领把族里年轻人送到日本留学，廖道明和潘植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神户。二战后活跃于大阪的潘铎元也是近代日本客家商人的代表。作

者在文章中给这些日本客家商人作了历史定位。赖郁如和陈玉珊则以泰国客家人为研究对象，他们合撰的论文为〈泰国客家方言群的社会网络：二十世纪初期至四十年代〉。对泰国华人社会稍有了解者都知道，泰国华人主要是以潮州人为主。但客家人的移民人数在1918-1931年间逐渐增加，攀升为华人侨民中的第二位。作者从泰国客家社会的整合方式与这段时期前后点切入，分析他们与其他方言群的交往与参与华社事务的态度，并探究客家方言群的社会网络如何展开。作者特别举出侨领伍淼源在客家方言群的对外关系与社会网络的建构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客家族群还是不曾泰国华侨公众事务中形成足以与潮州人匹敌之力量。

第三辑还有一个重点是客家信仰。庄仁杰的论文〈客家传统的形成与变迁：以新山柔佛古庙游神的客家公会为例〉，是根据作者多年来对柔佛古庙游神中的客家公会的诸多活动之观察与访谈为基础，讨论客家的传统是如何应对外在环境与现实因素而有所改变。这些传统有些是全新的发明，也有的是改变原有的做法而变成今日所看到的样貌。最后作者进一步指出，这些客家传统是不断变化的有机体，而非一成不变的事物。赖郁如和王和安合撰的文章为〈人群、信仰与网络：沙巴州山打根客家与谭公祖庙〉。谭公信仰在东马来西亚沙巴州之传布，可以说是客家祖籍信仰在海外的延伸。山打根谭公圣祖庙建于清光绪年间，一直以来是沙巴客家人及其他方言群共同祭祀的信仰中心，每年五月举办的谭公千秋宝诞活动，成为山打根华人社群重要联系网络平台和观光资源。作者认为对谭公信仰从中国广东惠州传布到东马沙巴的过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群与信仰，乃至社会网络展开的种种关系。

第四辑的两篇文章的性质比较特别。萧新煌的〈台湾与东南亚客家认同的论述与比较〉是作者主持一个整合型计划“比较台湾与东南亚客家经验：台湾客家族群发展的特色与典范移转”的研究成



果的综述。内容涉及客家语言、家庭、族群组织、宗教信仰、跨国通婚等面向。作者主要是要勾勒和建构台湾与东南亚客家族群发展的特色及其族群认同变貌的典范移转，并藉由两地的比较研究来凸显台湾客家认同的特色。而肖文评的〈客家与客家文化论略：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则是作者的单位（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近期申报的广东省特色重点学科客家学正式立项的成果。作者以客家学的学科建设的基本范畴为切入点，并以近百年来客家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就客家称谓、客家民系形成与分布、客家文化内涵及其基本特征等问题提出看法，希望能为客家学学科建设奠定理论的基础，也为本书作了适当的完结。